

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郝亚明 杨文帅

【摘要】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理论支点和实践抓手,但目前这一提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见意义均未得以充分挖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这一论断对于深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背景、政策目标、实践方向、基本性质等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概而言之,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失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背景;调适两者关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目标;增进共同性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向;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差异的统一体”的基本性质。

【关键词】共同性;差异性;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教授,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 贵阳 550025);杨文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原文出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3.6.5~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ZD21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1年度民族研究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研究”(项目编号:XTSZX-30)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核心内容之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已经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旗帜与方向。作为民族工作领域的顶层战略设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总体性和抽象性的内在特征,因而亟须发掘出合适的“中继器”作为理论支点和抓手,才能确保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1]上不出理论方向和实践目标的偏误。系统审视当前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文本和学术成果不难看出,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2]就具备承担此种中继使命的潜力。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无疑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重点与实践难点所在。就理论层面而言,以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作为认识基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基础性理论问

题都能得到进一步的明晰;就实践层面而言,如果处理不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共同体意识势必无以为继,更可能危及多民族国家建设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鉴于当前学界对“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的认识尚不够充分、全面、系统、深入,本文尝试将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背景、政策目标、实践方向、基本性质等问题关联起来进行分析,以期引发学界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关注与重视。

一、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背景

将抽象的政策话语带回到丰富的现实背景之中,对于准确理解政策的理论内涵以及合理规划政策的实践路径而言,都是极为必要且极有帮助的。就党中央为何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全新课题,学界探讨分析了诸如部分民众民族意识高

涨、局部地区民族关系紧张、国家认同与次国家认同张力明显、国内外敌对势力操弄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等现实缘由^[2]。透视这些学理分析,都指向一个深层次因素,即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失衡问题。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内在张力作为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背景进行审视,可以从基本国情、历史格局、战略时期、时代背景等若干角度予以详细解读。

历史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正确处理“一体”与“多元”之关系始终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造性地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与民族团结进步的民族工作策略相结合为主要特征,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3]。与此同时,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一些挑战性因素依然存在,局部地区甚至有所凸显,其症结所在直指共同性和差异性两者内在张力问题。我们把民族多样性视为国家建设的特色和动力,绝非固化或强化差异性,而是要看到多样性中不仅蕴含着差异性,同样蕴含着共同性。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存在并不必然以削弱或牺牲共同性为代价,而是可以最终形成尊重差异性与增进共同性并行不悖的局面。不可否认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民族工作实践与民族理论研究中呈现出“差异性凸显、共同性不彰”的趋向,这显然与各民族共同性因素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相悖,也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条件要求不符。在对当前形势客观研判的基础上,党中央对中华民族共同性问题日益重视,提出并不断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为了针对性解决民族领域中出现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的失衡问题。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强调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的历史结构基础。一方面,分布在中国辽阔疆域上的各族民众,在适应和改造各种不同类型生存环境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生产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服饰居所等方面的差异。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印迹,还是作为一种民族意识,这种差异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千百

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人员交往、文化交流、民族交融绵延不断,各民族的共同性、互嵌性、关联性持续增强,逐步形成了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多元一体格局。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的时候,也指出了这一格局自身的几个特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4]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出场较晚,它最大的问题是与现代国家形态之间匹配还不够完善,这就使得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必然的选择。又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民族统一体存在“分而未裂、融而未合”^{[4]36}的内在结构特征。中华民族的此种内在结构特征决定了其内部张力的存在,因而必须通过强调整体性的力量来维持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平衡,以确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安宁。就此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持中华民族内部结构的需要。

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险挑战的必要手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5]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时常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勾连渗透、颠覆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借口或工具,如利用边疆民族问题破坏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用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思想流毒渗透颠覆、利用单边主义手段肆意抹黑攻击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等。敌对势力的阴谋和伎俩是无限放大各民族的差异性、极尽可能地瓦解中华民族的共同性,通过操纵民族差异性大做文章,不断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伤害民族感情,以此破坏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建设根基,进而达成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缘政治阴谋。上述变局之下中国民族问题深受“外部势力干扰”和“国际斗争日趋尖锐”的压力,要求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必须以全球治理视野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积极防范和抵御国际上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图谋,构筑民族团结的牢固思想防线,防止因共同性和差异性问题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产生解

构威胁。

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两个大局”^①面前,机遇与危机并存。当前正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爬坡期、冲刺期,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是顺利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团结的力量来源于群体内部价值和利益取向的共同性、一致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同质的共同体,而是可以视作“差异的统一体”^②,中华民族既有同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在本质,也具有56个多元民族小家庭构成的外在表征。共同性和差异性共存是共同体的天然底色,忽视共同性或无视差异性,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在大团结大联合中实现伟大复兴。共同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认同载体和纽带,将分散的个体民族融合为整体的民族共同体,进而推动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团结一心,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差异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供给了结合要素和结合活力,各民族将存在的客观差异牢牢融合为共同体的构成部分,这样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就是主动结合的整体而非被动对立的个体,避免了共同体的内部分裂及外部侵扰。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中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切实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应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各类不确定难预料因素的必要前提。

二、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框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目标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要求在国家建设中调控“一体”与“多元”的内在张力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要求在中华文明延续中明确“一体”与“多元”的主线定位问题;“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则要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中妥善应对“一体”与“多元”的关联挑战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这一对核心关系。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首次确立了“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③这一重要工作原则,并且要求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该政策指向深

刻回答了事关民族工作全局的方向问题,从根本上框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目标和实践遵循。

其一,以增进共同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的形成与维持有赖于群体内部的共同性联结,其要想保有和发展这种广受成员认可的稳定形态,就需要不断强化和巩固自身的共同性。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发掘与提升已经成为民族工作实践的价值旨归,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随着国内外局势面临全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根基遭遇多重侵蚀,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面临失衡风险,这亟须通过进一步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来加以解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根本目标是要稳固、发掘、提升、拓展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并确保其能够涵盖包括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利益和各民族利益等在内的各个领域。明确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通过“五个认同”^④“四个与共”^⑤“三个离不开”^⑥等具体政策指引,将共同性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结合。

其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尊重和包容差异性。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共同性和差异性共生共存为基础。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同质共同体,增进共同性也并非片面追求同质性。共同性和差异性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关联共生的内在结构,这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高度吻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经历了“求同”与“存异”的共生过程,共同性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差异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多彩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因而展现出殊途一体的内在特征和斑斓缤纷的整体面貌。其次,存在差异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事实。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各民族之间的客观差异性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不承认这种差异性,就难以调动各民族大团结的力量进而真正凝聚共同性。一定程度上,尊重和包容各民族在风俗习惯、建筑风格、文化

艺术等方面的差异性,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方式。最后,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能够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无视差异性,不仅不符合民族差异客观存在的事实,还会滋生族际之间的不信任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就难以凝聚共识。在不削弱不危害共同性、剔除落后的影响民族进步因素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民族差异性中的积极部分,目的是要在承认各民族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夯实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根基,继而在人心凝聚、团结奋进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三,致力于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从对立消解调适到辩证统一。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有同无异,没必要强调共同体;有异无同,形成不了共同体”^[7]。中国作为历史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何调适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历来是重中之重,以至长久成为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基础性问题。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往往存在“对立消解”的理论和实践误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视为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或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强化共同性而否定差异性,或认为共同性和差异性不能共存,乃至持有要么增进共同性要么消解共同性的二元对立论。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1],并视之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就是要把上述“对立消解”的认识误区调节到“辩证统一”的正确方向上。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8]。共同体中的个体关系是互依性关系,共同性是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共同体只有兼顾个体的差异性,才能实现共同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从对立消解调适到辩证统一,构建了这样一个认知图景:共同性是主导、根本和前提,差异性是从属、基础和要素。现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必须牢牢坚持两个原则:第一,要凸显共同性的方向,深刻认识共同性之于中华民族和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积极意义;

第二,要平衡两者关系,既不以差异性削弱共同性,也不以共同性否认差异性。

三、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指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向

党中央提出“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1]的要求,指明了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续命脉,没有共同性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首先要明晰和确立增进共同性这个实践指引。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的背景和初衷都旨在发掘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性^[9],只有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凝心聚力有效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内部挑战与外部压力。遵照这一逻辑理路,可从以下五个具体实践层面着力推进,全方位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纽带。

其一,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增进共同性。中华民族是一个绵延不绝的民族实体,同时又蕴涵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构成了增进共同性的认同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各民族在千百年来不断追求团结统一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构筑起了共通共融共享的语言文化、情感心理、伦理价值等思想纽带,这在今天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族群认同理论认为,族群共有的精神、形象、符号等文化资源,又使它们能适应现代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是加强民族统一的基础^{[10][139]}。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转换促进。我们在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总钥匙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畸重于物质家园建设而轻视共有精神家园构筑,族际差异强化泛化固化,都有可能会造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产生认同危机和离心主义的恶果。现阶段,要通过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各族群众建立现代化思想观念,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方式,持续强化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其二,在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增进共同性。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形成于各民族长久的历史交融汇聚过程,各族人民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

和亲和力。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能够有效彰显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各民族发展历程的内在关联,能够有效建构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内在关联,能够有效建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各民族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切实提升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由此可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既是增进共同性的历史基础,也是增进共同性的历史维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并非短促偶发于近现代,而是积淀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河,可以说中华民族很早起就自带趋向共同性与尊重和包容多样性的历史基因。当前,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要让全国各族人民充分了解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进程,就是要让各族人民充分唤起命运与共的历史记忆,就是要让各族人民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渊源,客观看待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融合共存现状,正确把握中华民族“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不断强化各民族“四个共同”“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共识。

其三,在促进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共同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共同体作为人群共同体,总要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这决定了其结合原因和结合动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共同性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空间、文化等全方位嵌入的特征,只有不断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和守望相助,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共同性社会条件,才能有效预防和消减因差异性而生的矛盾和摩擦。大量研究表明,族际交往交流交融的缺失,会导致群体排斥乃至社会撕裂,产生共同体意识匮乏的“平行社会”^[1]。党中央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目的在于建立“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式社会,进而为消除民族隔阂和实现民族交融创造良好条件。要充分顺应我国各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新趋势,通过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等途径,构筑各民族在各领域各层次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的社会共同体形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

共同性的社会结构支撑。

其四,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增进共同性。当前各民族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部分源于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时至今日,全国范围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各民族携手接连取得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伟大成就,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然而也应看到,民族地区仍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短板,高质量发展仍然受到许多因素制约,由于发展滞后所衍生出一系列差异性问题的,无疑对增进共同性造成了严重阻碍。利益是共同体结合的基础,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能够显著缩小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中央提出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等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旨在提升各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以改革发展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增进共同性。

其五,在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中增进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国家层面的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因此对共同体共同性的追求、共同体差异性的调衡,同样需要通过国家政治建构的过程。学界普遍认为,作为由共同文化维系的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形式结合而成的政治社会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12]27}。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共同体发展历史,其内部虽早已具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性纽带,但在近现代以来多次遭遇的民族解构危机表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政党领导和现代化的国家政治制度,中华民族高度凝聚的共同体形态很难永久保持。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来完成^[13]。不论是应对国内问题还是国际危机,只有把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纳入党的全面领导的正确轨道上,才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国家

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四、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性质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在历史与现实交融中形塑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兼具的命运共同体,这界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性质。“中华民族”等概念虽然是近现代才出现的术语,但其本体是几千年来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各地域共同追求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回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程,各民族之所以能够从“多元”走向“一体”,源自各民族人心归聚和精神相依的内生动力。换言之,多元一体的民族性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共生血脉,“一体”与“多元”的互嵌互构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无法湮灭的演进基因。由历史延续而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功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和发展优势保留至今,其中“一体”明确主线和方向,“多元”提供要素和动力,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延续的有机整体。各民族历史上的迁移、分化、融合所造就的各种关联性,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面貌^[4]。因此,尽管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政策话语是2014年后才广泛进入大众视野的,但其实历史上“华夏民族”“中华”“九州”等术语都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较早形态,及至近现代明晰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等术语无一不是如此。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既是一部各民族汇聚融合的历史,也是各民族共同构建巩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辽阔疆域、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伟大精神的“四个共同”^[5],^[15]清晰概括出中华民族历史延续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四个共同”理念贯穿于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中华民族的演进特征又集中地表现于“四个共同”方面。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相关学科研究的考证,中华民族原初就是由多个地域氏族融合而来,炎帝、黄帝、蚩尤等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域的部落经过涿鹿之战后,逐渐确立了中华民族同祖共源的认同记忆、形成

了各民族悠久密切的文化关系,并奠定了后世中国“大一统”理念的思想渊源。此后,中华民族又经历了长久孕育文明共同体的过程,分散的民族单位渐进至“多元合一”。以王朝国家场域中的“华夷一统观”为例,“包含了承认文化差异、讲求和而不同等理念,同时也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内地和边疆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16]。有学者在考究“中华”概念后认为,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华”从最初用来区分“胡族”与“汉族”,到逐渐兼容胡汉、兼容南北,再到唐代最终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这正体现了此概念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度^[17]。正是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文明特质,使得中华民族的文明版图不断得到拓展扩大。中华民族在近代遭遇列强凌辱的民族危机证明,各民族的“多元”如果无法凝聚为“一体”,则中华民族就会面临解构的威胁;反之,各民族“多元”如果高度凝聚为“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就会更加稳定。中华民族在长期历时性的互动联合过程中,各民族间的有机联系日益增加,不断超越民族之间“小我”的差异性,中华民族“大我”的共同性才得以绵延不绝地形塑和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现实建构的有机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共同体实体,与“想象的共同体”有着本质区别,但相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而言还存在差距,这一差距集中体现于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挖掘和凸显上。中华民族实体结构特征直到近代才完成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急促转变,短期内难以系统性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基础并催生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由此造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共同性和差异性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持续困扰着中华民族建构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进程。共同体内生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成员的共同性,这就要求差异性始终要界限于共同性之下,否则共同体的稳定性将难以为继,存续也面临危机。共同体被视为集体社会的行动者,个体只有通过共同体这个主体,才能在自身的经验中获得完整的意义^[18]。换言之,各民族只有置身于中华民族整体框架之下才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新时代民族工

作面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等时代特征,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基本原则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应对民族领域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首先,必须明确中华民族是一个实体民族的认识。不可否认,当前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将中华民族虚体化的错误认知。事实上,各民族在数千年来交往共生、经济互助合作、文化交流互鉴的生产实践中,早已内蕴生成明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内嵌于历史、文化、生活,植根于经济、政治、社会,为中华民族作为实体民族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其次,要处理好大家庭与不同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间的关系。”^[19]中华民族大家庭为56个家庭成员提供温暖包容的庇护,平等地对待56个家庭成员,同时也需要56个家庭成员手足情深的共同守护。

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性和差异性兼具的命运共同体。由于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共同性将持续增进,中华民族的内部差异性仍将长期存在,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未来演进的总体趋向特征。针对共同性和差异性长期并存的现实,关键要把差异性置于共同体之内辩证看待,认识到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不存在本质的认同差异,仅存有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阶段性发展差异^[20]。离开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无从谈起;忽视差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难以做起。就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征而言,共同性是主导方向,要不断增进共同性,同时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另外,也要明晰两者共生并存的界限,即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基础,然而现实中的共同体与理想中的共同体不同,现实中的共同体并不会浑然天成,共同体难以要求共同体成员无条件地保持忠诚。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就“共同体存在的理想和实际差距”指出,共同体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轻松获得的稳定形态^[21]。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时

刻注意保持共同体稳定的界限,即明确规定哪些方面可以“异”,哪些方面必须“同”。各族人民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自身的生命安全、安身立命和幸福生活才有坚强的保障。要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认同中华民族作为“四个共同”的历史共同体和“四个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自觉维护和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享有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权利的同时,更要积极主动地履行维护共同性的义务,合力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永续发展。

五、结语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1]。“这四个关系,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是管总的,对其他关系起着引领作用。”^[7]依照这一政策定位和逻辑判断,无论是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建构而言,还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进程而言,能否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都已经成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央之所以赋予“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如此之高的政策定位,背后固然有应对“两个大局”时代需求的现实考量,亦有中华民族沧桑演进中积淀的历史智慧,更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方面的理论跃升。在此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断言,把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理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就能冲云破雾;把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理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将会事半功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塑于各民族长久深层融合汇聚及应对民族内外危机的实践过程,是各民族主动追求幸福生活中自觉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必然结果。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核心在于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共同体的中心理想。“对这一定义至关重要是两方面的关联:首先,分析层次的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关联;其次,认同的保持和变化之间的关联。”^{[10]18}从这种角度分

析,新时代民族工作中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需提高以下几方面的认识。其一,不应把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视作外部关系,而应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关系范畴来把握;其二,共同性和差异性不是简单地维持平衡关系,差异性应遵循不侵蚀和不损害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前提;其三,共同性和差异性关系的变化特征,决定了共同体要做好长期应对变化和重塑认同的准备。综上所述,本文就共同性和差异性两者关系基本认识可以大致概括为:增进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续根基,框定了主线方向;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方式,框定了从属要素。进而言之,增进共同性同时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联结方式和基本特征。共同性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主线与方向,差异性供给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要素与动力,两相结合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凝心聚力共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注释:

①“两个大局”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②“五个认同”即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③“四个与共”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④“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

⑤“四个共同”即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的:“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1-08-29(1).

[2]郝亚明,秦玉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议程设置研究: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的分析[J]. 学术界,2022(6): 63-73.

[3]郝亚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话语趋向[J].

民族研究,2022(4):1-12+139.

[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5]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10-15(2).

[6]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4.

[7]尤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科学指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 中国民族,2021(11):48-5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9]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个维度[J]. 西北民族研究,2021(1):12-21.

[10]史密士.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MUELLER C. Integrating Turkish communities: A German dilemma[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6(5): 419-441.

[12]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13]郝亚明.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大基础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5):1-6.

[14]麻国庆.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4):13-23.

[15]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9-09-28(2).

[16]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9(5): 14-18.

[17]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7(4):128-136+225.

[18]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

[19]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29.

[20]郝亚明,杨文帅.国民共同体教育叙事的中西比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2(10):46-57+183.

[21]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